

《澳門近代博彩業史》讀後

葉 農*

博彩業對澳門獨特文化形成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胡根博士所著《澳門近代博彩業史》，為研究澳門博彩業發展起到以下的作用：一、正本清源，展現澳門博彩業興衰發展的歷史背景。二、探幽發覆，對澳門博彩制度的變化、發展及澳葡政府制定的保障博彩發展的相關措施進行分析。三、古為今用：雖然它涉及僅係鴉片戰爭之後到20世紀初這段時間，但對當今澳門博彩業的未來發展卻相當有借鑒意義。

眾所周知，澳門被稱為“東方蒙地卡羅”，即東方賭城。賭博業，講得體面一點，“博彩業”，在澳門經濟中一業獨大；從世界角度來看，經營規模也已經超過美國的拉斯維加斯，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賭城。在當今大多數國度和地方，賭博僅是諸多社會問題之一；而在澳門，賭博從19世紀40年代開始，就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社會問題，而是政治，是經濟，是文化，甚至是澳門歷史發展的中心問題。

由於博彩業名聲不佳，近代以來，澳門的博彩者經營者、對自己的營生歷史諱莫如深，學術界對其研究，亦陷於浮淺。雖然已經有何漢威先生所著《清末廣東的賭博與賭稅》、《清末廣東的賭商》及《廣東進士賭商劉學詢》，開創了廣東、澳門博彩史學術研究的領域；趙利峰著《晚清粵澳閩姓問題研究》將閩姓彩票發展史研究推至極致，但案頭上胡根先生這本近五十萬字的專著——《澳門近代博彩業史》，該領域內第三部著作，卻有着更廣闊的研究領域，更系統的內容。它主要研究了晚清以降澳門的整個博彩業，研究在粵澳兩地同時流行的賭博品種，論及博彩

走上合法化的各個階段，詳細分析了澳葡政府維護博彩這一特殊行業的各種手段，以及博彩稅收在不同時期受內外因素影響的情況。它對理清澳門近代以來博彩業發展這段“剪不斷，理還亂”的歷史麻團，將有“正本清源、探幽發覆、古為今用”的意義！

正本清源

從正本清源的意義上來看，此專著用了四章的篇幅來為讀者展現澳門博彩業興衰發展的歷史背景。這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首先，澳門博彩業的興起，與自古以來華人好賭、特別是粵人好賭緊密相聯。作者認為“世界上當然沒有‘天性嗜賭’的人種，賭博並非廣東獨有的社會現象，但廣東確屬賭風最為熾烈、而且是持續時間最長的省份”。究其原因，“廣東是中國近代工商業和對外經濟最早興起的省份，又是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口岸之一。早期商業與投機是分不開的，社會一方面充滿了商賈，另一方面充滿了冒險性，賭博在廣東的持續熾烈應與此有關”。

* 葉農，暨南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副研究員，史學博士，澳門大學訪問學者。

筆者要為作者補充的是，中國社會是一個等級社會，大量社會底層的民眾，要擺脫其低下的社會地位缺乏有效的途徑，故許多人希望通過一賭，而迅速致富。因此，賭博為他們提供了一條捷徑，故大量民眾對此趨之若鶩，不惜以全副身家投入。

其次，作者將澳門近代博彩業的興衰，放到了廣東省官府、民間與澳葡政府對賭博業的不同做法的歷史背景中來考察。澳門博彩業在近代從非法行為轉為合法經營，再變為經濟支柱的過程中，廣東省在同治、光緒及宣統年間對賭博業的開放與禁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作者研究了同治、光緒、宣統年間，勞崇光、劉長佑、毛鴻賓、郭嵩燾、蔣益澧、劉坤一、李瀚章、岑春煊等任督撫期間，對廣東賭業的開放與禁止之後，認為：“清朝中央政府及廣東地方政府在禁賭政策與開賭承餉方面舉棋不定，經常是換一任總督(或巡撫)就變一次。雖然開賭利錢豐厚，但朝廷和地方政府朝令夕改，時而大開賭禁，時而趕盡殺絕，承餉的商人不但要冒極大的風險，在繳納各種名目的賭餉之外，還要向文武官員們送上為數不菲的陋規孝敬，一次又一次地成為清朝地方政府大員們予取予攜的搖錢樹。”同時，作者又認為“斯時廣東賭風大盛而盜賊四起，令地方官員和朝廷極為頭痛。一時間，禁賭與籌餉竟成魚與熊掌，難以取捨”。

而相比之下，澳門政策穩定，組織比較法治，也促進了澳門博彩業的發展。“澳葡政府的政策較為穩定，很少朝令夕改，‘法治’的味道比清朝政府濃，而且在博彩合法化之後，葡萄牙人認準這條路就一直沒有回頭。”

另外，作者還另闢蹊徑地研究了20世紀初在“澳門界務之爭”中出現的“香洲開埠事件”。香洲是清代廣東對外開放的九個商埠之一，與香洲同時“開埠”的還有臺山公益，均為兩廣總督張人駿批准開辦。早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間，盛宣懷等就曾打算在澳門對面島開設商埠，但此議受到廣東地方官員和百姓的反對，未獲朝廷允

准。光緒三十三年(1907)，清政府實施“新政”，鼓勵華僑實業家回國投資。

而同時，葡萄牙人從20世紀初開始，又計劃通過修浚河道，將大小橫琴島、洋船灣、十字門等地歸其所屬，並通過勘界，將這些佔領行為完全合法化。

1908年，面對葡萄牙人在澳門不斷的擴界行為，香山人民相當憤慨，再加上澳門成為賭博淵藪，因此，邑人王詒和美商伍子政，計劃集股在香洲開埠，於1909年獲清政府批准。香洲開埠後一段時間內，商業興旺，有大小舖戶一千多間。宣統三年(1911)，清政府批准香洲成為自由港，後因香洲火災，埠商和地方鄉紳內度，投資者轉移資金以及辛亥革命爆發等複雜原因而未成。

這一開埠事件，對澳門影響很大。作者認為：“香洲開埠對澳門當然會有巨大的影響，由於受到中方的壓力，以及廣東尤其是香山縣民眾的抵制，澳門商務大受打擊。澳葡政府在這段時期如何入不敷出，財政如何困難，可從當時的報導一窺端倪：……詎料屋漏又逢連夜雨，因受內地官民的抵制，由內地前往澳門的旅客人數劇降，番攤賭館、人力車、豬肉攤販等行業慘澹經營，與澳葡政府為稅務問題發生矛盾，導致人力車夫罷工，肉行要求減稅。……起初，葡人社會對香洲開埠一事也非常緊張，認為會對澳門社會經濟造成沉重的打擊。剛開埠的香洲，也曾經出現過一陣繁榮興旺的新景象，沉睡千年的荒灘上崛起了一座近代海濱新城。香洲開埠轟動了澳門，澳葡當局惟恐當地商民離澳遷往香洲，在勘界問題上被迫退讓。”這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粵澳兩地之間的矛盾與衝突。

第三，作者理清了近代以來澳門博彩業發展的歷史軌跡。由於華人好賭，故自從葡萄牙人入居澳門以來，賭博就已經傳入澳門，但它們都屬於非法行為，受到了中國政府多次立例管制與禁止，而且賭博依照葡國法律，也是被禁止的。

作者認為澳門博彩業合法化，是始於19世紀初西方慈善彩票引入。“1810年1月5日，澳

門才首次被葡國方面准許每年發行一次慈善彩票。1810年6月15日，喪權流亡到巴西的葡萄牙王朝攝政王唐·若奧五世，鑒於澳門財稅困難，遂敕令准許在澳門成立一家彩票發行站，從中抽取博彩稅資助那些福利、慈善機構。這是澳門合法改選彩票的最早記錄，由於冠以慈善的名義，發行對象也不是華人，故未受到來自清廷方面的嚴厲制止。”

作者還引用大量史料，糾正學術界一些關於香港開賭早於澳門的說法：“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廣角鏡出版的《香港賭博史》一書中，將港英政府1867年6月17日頒佈的〈維持社會秩序及風化條例〉，賦予港督公開招商承餉開賭一事，視為中國賭博史和香港賭博史上賭博合法化的創舉。作者斷言：‘在麥當奴未公開招商承餉開賭之前，香港固然沒有前例，即在中國，甚至澳門，也沒有先例。’（……）其實，澳門的賭博合法化比香港和內地早。該書作者可能不知道，早在麥當奴公開招商承餉開賭前十九年的1847年7月，澳葡政府就把‘中式彩票’即闖姓賭餉正式納入財政收入之中，1848年7月起又增加了‘中式博彩’即番攤的稅項。1851-1863年，在基馬拉士總督執政期間，澳門就開始實行賭博專營。而在香港‘開埠’之前，獲葡萄牙王室特許改選的澳門仁慈堂彩票，更已經賣得滿街都是。澳門不僅僅是公開發行彩票早於香港，中式賭博的合法化也起碼比香港早十八年。（……）澳葡政府在1849年之前已經開放賭禁並從賭博合法化過程中抽取極為可觀的稅餉。”

關於學術界一般認為的是澳門總督亞馬留（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開放賭禁，但實際上，其前任彼亞度（José Gregório Pegado）時，開賭政策就已經制定，卻來不及實施，是亞馬留抓住了開賭的歷史契機：“簽署批准設立番攤賭館識的雖然是彼亞度總督，但他在任內沒能讓番攤賭館公開營業。中式賭博在澳門全面合法化時擔任澳門總督者，正是積極推行殖民擴張政策的亞馬留。（……）亞馬留把澳門與清朝的聯繫割斷

之後，清朝的禁賭令就不能夠再約束澳門的葡萄牙人了。澳門開放賭禁並非偶然，而是粵澳兩地賭風歷來熾盛，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偏偏被亞馬留抓住了一次難得的機遇。（……）當時社會環境的逐步穩定，中外貿易的恢復，為澳門開賭奠定了有利的基礎。而當時澳門本身的經濟狀況卻十分惡劣，華人又抗拒向葡國人交稅，亞馬留開放賭禁彌補稅收之不足也就順理成章了。”

而首先開放的博彩就是白鴿票，“白鴿票屬於中式彩票，在廣東地方甚為流行，故此也是澳葡政府開放賭禁之後首批公開招商出投的彩票賭博品種”。

在19世紀中葉前後，澳門博彩業的興起，還有許多其它歷史的原因：“非法的賭博在澳門變成合法的博彩業，這個轉變過程可以說具有許多偶然的因素。鴉片戰爭後英國人佔領了香港，直接威脅着澳門這個國際貿易港口的生命線。太平天國革命的爆發令大批內地難民湧入澳門，接踵而來的‘豬仔貿易’，讓澳門剛剛興起的博彩業得到迅速的發展機會。港英政府在民間壓力下的全面禁賭，則使澳門的博彩業錦上添花。由1840年至1872年，即鴉片戰爭爆發到港英政府禁賭這三十二年間，是澳門博彩業全面興起的時期。（……）太平天國起義與第二次鴉片戰爭給澳門帶來的直接衝擊有二：一是促使澳門華人的口急劇增加，二是促使澳門華人資本的大大增加。（……）1872年1月13日，麥當奴貼出禁賭告示，明示於1月20日起封閉所有賭場，所有開賭牌照一律取消；嗣後一切賭博如闖姓、白鴿票、花會及其他有彩私賭，一律禁絕，並加僱偵探嚴密偵緝，違者拘罰不貸。香港嚴厲禁賭後，大批賭客從香港轉往澳門，使澳門早期博彩業走向勃興。（……）進入19世紀50-60年代，中國內地半殖民化危機加深，大批無法維生的手工業者，農民和破產商人，紛紛離鄉背井到國外謀取生路。澳門逐漸成為‘苦力貿易’即人口買賣的港埠，聚集了數以萬計的外來人口。拿到賣身錢的苦力，在等候船隻的日子裡聚賭，希望贏一筆大錢後贖

身回鄉過好日子。手上擁有眾多苦力和金錢的人口販子也想借此斂錢，便開起賭來。”

探幽發覆

在探幽發覆方面，此著作體現為行家講行話。研究澳門博彩史，須懂得博彩，才能透視澳門博彩業的內部運作，探究出澳門博彩業發展的規律來。作者在第五、六兩章裡，充分體現了其對澳門博彩業熟悉，用行家的眼光透視博彩的內幕，對澳門博彩制度的變化、發展及澳葡政府制定的保障博彩發展的相關措施進行了有說服力的分析，發前人所未發，言常人所不能言者。許多一般人不容易看懂的法規條文，作者從行家裡手的角度，能一語中的，鞭辟入裡地展開分析，探幽發覆。

特別是論及澳門公物會與博彩業的關係，選擇性開標、制止直接向賭商抽餉、賭商要求獨家經營引起的修章、明喊與暗投競投方式的轉換，舖票與闖姓捆綁競投，均有作者的獨特見解，相當精彩。

作為澳門地區控制公共財政主要稅收來源——博彩稅的職能部門，公物會初屬於議事會管轄，亞馬留聘任澳督之前已經脫離議事會，成為一個新的機構。此後，澳門公物會逐步演變成為一個政府財政部門。由澳門博彩開始合法化時起，每年宣佈承充賭餉以及公佈博彩稅收益的，都是澳門公物會。因此，公物會為徵收博彩稅，也與澳督發生過一些分歧。

由於澳門公物會對承充賭餉採取“選擇性開標”，一度引起了澳督與公物會理事官的分歧。“19世紀70年代末，承充番攤已是澳葡政府相當重要的稅收，里斯本方面也極為重視澳門的番攤賭餉收入是否正常。由於審批番攤賭餉和鴉片售賣的權力具體由澳門公物會包辦，而公物會理事官又一度採取‘選擇性開標’的辦法，並非價高者得，很容易出現私相授受、貪污舞弊的情形。1879年2月，澳督與公物會理事官為熟鴉片

及番攤承充問題發生分歧，導致當年的番攤承充被迫押後。”

除開公物會之外，由土生葡人控制的議事公局也因徵收博彩稅問題，與澳督發生過分歧。“土生葡人控制的議事公局於三年後（1883）再次向賭商實行雙重課稅。在賭商繳納了承充博彩生意的款項之後，議事公局又向各闖姓館經營者徵收一般商戶所交的公鈔。此舉令賭商們大為不滿，聯合向澳督提起申訴。（……）澳督遂行使職權予以糾正，制止咁麻喇（Câmara，即議事公局）對闖姓館抽收公鈔的不合理做法。”

特別是賭商要求獨家經營引起的修章，充分揭示了澳門博彩業發展的獨特性（博彩業作為特種行業，比較適合壟斷經營），同時也適應了葡萄牙人長期執行的專營制度，這為20世紀30年代以來，澳門博彩業長達七十餘年的專營運作，打下了伏筆。“1880年8月，澳門公物會準備公開競投‘澳門番攤館十二間並打紙牌公司三間’。《澳門政府公報》發出有關通知之後，情況突然發生變化，有人向公物會表示可以高價承充澳門十二間番攤館，但同時要求‘全盤領取’即實行獨家專營。於是，澳門公物會隨即發表由澳督簽署的通知，表示願意修改番攤章程。（……）上述變更條件（……）還禁止二等牌館、下等牌館、骰子館及擲棉羊等雜賭。作為保護博彩專營權的回報，公物會對於私開賭館者從重處罰，罰金高達1,000元之巨。”

同時，為了防止舞弊，競投的方式有明喊與暗票交替使用。“澳門公物會每次招商承充博彩牌照，都是採用‘明喊’競投的方式。這樣的競投方式比較簡單，誰人出價，誰出的價碼最高，一目了然。但弊端也同時存在，如果參與競投的賭商串通一氣，事前談妥彼此可得的利益，競投時聯手壓價，也有可能得逞。所以，澳門公物會有時會採用‘暗投承充’的方式，避免賭商們聯手壓價。”

作者還詳細探究了澳葡政府為保障博彩業發展所採取的各種措施：“到了19世紀80年代後，澳門博彩業逐漸進入穩定發展的階段。博彩稅收

成為澳葡政府最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澳葡政府為了保護這一收入來源，採取多項措施確保商人不會逃稅，並使之逐步規範化，形成有澳門特色的公開競投、開標(票)以及預防賭商作弊的各種制度”，這些制度包括：票商應有擔保人；賭商須以產業作保；設定票廠數量有限額；毀約賭商須賠償損失；公開招標承投；增設春節臨時賭牌；而各項措施實施的意義在於其中，“從早期賭牌的無序發展到‘明喊’和‘暗票’競投互相交替，又從專營權的設立發展至澳門半島專營權和離島專營權的分設，無一不顯示出澳葡政府對博彩業批給制度的改進步伐”。

在“各項博彩合同的違約罰則”一節裡，經營賭博雖然利潤較大，但畢竟是一種高風險的特殊行業，公物會作為博彩生意的批給者，當然不會自找麻煩，將風險擔上身。最穩妥的辦法之一，就是把博彩行業的風險轉嫁給經營者即賭商。因此，在澳門博彩行業合法化早期，葡萄牙人就已經摸索出一套認為行之有效的批給制度。為各種博彩合同設定罰則，就是其中之一，以確保博彩合同朝着有利於政府稅收的方向執行。

作者認為“為各種博彩合同設定罰則固然可確保博彩合同朝着有利於政府稅收的方向執行，不過還有很重要的一點，那就是澳葡政府基本上能夠尊重博彩合約的法律精神。歷來祇有賭商違反合約被取消營賭資格，卻從來沒有由於澳門政府政策或人事發生變化，而主動毀約或要求賭商增加賭餉”。這一點相當重要，澳門現代博彩業的基礎由此奠定：“當時澳門博彩業最大的市場不是本地或香港，而是在廣東。賭商們初期並不看好澳門，祇是在內地厲行禁賭期間把澳門作為臨時的賭業大本營，但隨着時光流逝，澳門適合博彩業發展的政策與社會穩定性優勢就逐步顯示出來了。賭商們由粵澳兩地跑，直到在澳門設立總部，把投資重點放在澳門，逐步奠定了今天澳門博彩業的基礎。”

雖然許多中國人沉迷於賭博，但是人們對博彩業是持憎恨態度的，因為賭博引起道德淪喪，

治安敗壞。博彩業對澳門卻是一劑挽救澳門於水火的良藥：“合法開賭又能夠增加政府庫房收益，使其他無法解決的財政危機迎刃而解，並且以賭稅用於慈善事業，平衡及緩和各種社會矛盾。澳葡政府是在本地經濟蕭條、財政收入朝不保夕、社會危機重重的情況下，讓多年來一直受禁制的賭博合法經營的。也就是說，如果澳葡政府不讓博彩業合法化，社會問題可能會更大、更多。現在回顧這段歷史，博彩合法化確實挽救了葡萄牙人，令澳門社會和經濟轉危為安。”

作者在〈博彩業對晚清澳門社會的影響〉一章裡，向讀者介紹了博彩業合法化後給澳門帶來的好處：增加財政收入；帶動澳門旅遊娛樂業發展。博彩業的繁榮，首先受惠的就是旅遊行業；促進澳門對外水陸交通；改善市政建設。博彩業的蓬勃發展，不但刺激了旅遊、交通的發展，也促使澳葡政府在市政建設方面投放更多公共資源，使澳門迅速成為一個比較發達的商業城市；刺激工商業發展。城市發展的步伐加快，澳門工商業逐漸發達起來，建築材料、土地開發與建築、金融、貿易、鴉片及其它專賣事業、工廠等相應發展起來，使澳門工商業走向多元化；博彩收入增加，使澳葡當局強化軍警建設，維持了澳門本地的治安。

此次澳門博彩業合法化，是澳門經濟模式的一次重大轉型，也大大地促進了澳門城市的發展。它標誌着澳門的經濟已經從16世紀中葉開始的、以海上貿易為特色的藍水經濟，轉型為以休閒娛樂等服務業為主體的黃土經濟。從此，澳門人不再出海，也不需要出海，而是坐在家裡，坐等遊客上門，通過提供服務而獲取收益。形象地說，就是從以前的通過與大海搏鬥，轉運商品，獲取差價的經濟模式，轉變為通過提供場所和服務來獲取收益，這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黃土經濟。自從17世紀20年代，葡萄牙人在澳門建成澳門城後，葡萄牙人就一直居住在澳門城牆內的一小片地方，而且隨着葡萄牙人海上貿易的衰落，葡萄牙人就無力，也無心再要求擴張地界，擴建城區了。

隨着18世紀中葉以來澳門開始的經濟轉型，葡萄牙人對澳門土地需求日益增加，他們擴張地界的要求也日益強烈，至19世紀中葉，隨着博彩業逐步興旺，興建賭場，需要土地；大量遊客擁來澳門，需要土地來興建酒店、旅館等設施；大量移民來澳門居住，需要住房。因此，澳門對土地的大量需求，促使葡萄牙人終於走出了武力擴張的這一步。因此，博彩業合法化，應該是葡萄牙人在澳門擴張的內在動力之一。

同時，作者也指出了其給澳門帶來的社會風氣及治安敗壞的負面影響及澳葡政府所採取的應對措施：如強化治安，加強警隊建設；設立中國人口戶籍登記，除了為陸地人口設立戶籍之外，澳葡政府還對水上居民加強治安管理；取締非法賭博；與鄰近地區互相移交逃犯。對於這個問題，人們往往祇注重博彩業負面因素，而忽視了其正面作用；在談其負面影響時，又往往忽略了減輕負面影響的措施；作者此項研究，首次將它們有機地結合起來了。

博彩業構成有三個要素：賭商、賭場、賭客。但是要探究近代以來澳門的賭商，又是何其之難：“經營賭博在澳門雖說是合法行業，但畢竟屬於偏門，登不得大雅之堂。澳門的賭商之中，有的人發財立品，後來改行從事其他行當，也就不再在自家的傳記及族譜裡面，留下賭博這樣‘不光彩的一頁’。後人當然也要為尊者諱，為他們立傳時，祇寫這些賭商們如何得到朝廷功名光宗耀祖、如何行善及捐資辦學，對經營賭業之事隻字不提。因此搜集整理賭商的歷史資料談何容易。筆者祇能從當年的歷史檔案、報紙與族譜中大海撈針一樣，尋找這批在澳門歷史上對社會產生過重要影響的商人”。可以看出，該書作者曾經下過苦功夫來搜集史料，因此，該著作的特點之一，就是史料豐富詳實。

作者費心搜索的結果，就是對澳門中外賭商進行了一次大梳理，梳理了幾十位中葡賭商。還重點介紹了華人賭商王祿、王棣家族，何老桂、何連旺家族，盧九、盧廉若家族，清末民初澳門

著名賭商蕭瀛洲（蕭登），柯六、李光（李鏡荃、李鏡全）；而葡人賭商則有 Maximiano António dos Remédios（魚塘仔）、先拿·非難地（Bernardino de Senna Fernandes）家族等。這些人在澳門近代史和中國近代史上，均是有影響的人物。

另外，作者還探討了賭商在澳門的社會地位：“賭商在澳門的日子要比內地好過得多，澳葡政府開放賭禁的政策相對穩定，在澳門的經營環境也相對較好。已經取得澳門實際管治權的葡萄牙人，對來自內地的所謂‘清議’壓力不屑一顧，賭商們可以在澳門放膽開賭。況且，澳門的社會環境並不排斥賭商，賭商們祇要交足承充費用，依照澳葡政府的指令開設攤館票廠，就能夠像經營其他正行生意那樣營賭了。澳門賭商的社會地位較內地高的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葡萄牙商人後來也加入博彩業的競爭中，並且與華商合作經營各種博彩業。以澳門土生葡人為主的葡萄牙賭商，經營博彩業時有他們獨特的優勢——更容易與澳葡官方溝通聯繫。無論是承充競投、私下談判還是賄賂葡萄牙官員，都比華人便利。不過，澳門的博彩業又十分依賴華人”。

具體社會地位表現在：1）參與官方外交禮賓事務：“1891年春，俄國皇太子尼古拉（後來繼位成為沙皇）訪問澳門，澳葡政府邀請華葡紳商組成公會以便辦理迎接禮儀。（……）1911年，財商蕭瀛洲被澳葡政府邀任全澳慶祝葡萄牙建立共和政制一週年大會副會長兼第一分會（華人慶祝會場）會長之職；另一位著名賭商李鏡荃則擔任大會委員。”2）擔任澳門公鈔局成員：“葡萄牙人在完全佔領澳門之後，各澳門居民抽取田地屋宇業鈔。為了便於向華人抽稅，澳葡政府委任了一些華人富商為澳門公鈔局（即公鈔會、業鈔公會）成員。”3）擁有全澳16%的電話：“電話在清末被引入澳門，是當時相當稀罕的奢侈品，用上電話的人家非富則貴。”4）納稅最多：“澳葡政府邀請華人賭商出任公鈔局成員，還是沒有道理的，因為賭商們納的稅最多，對政府財政的貢獻也最大。”5）參與理商局、海島市政事務等。

另外，澳門賭商也熱心慈善與社會公益活動。作者認為“貧窮、饑餓、疾病，是造成社會不穩定的因素。賭博，會令一些人由富變窮，甚或令貧者愈貧，使社會矛盾尖銳化。但是，把一部分博彩收益用於慈善事業，為貧病無依的人士提供基本的生存條件，又往往得以化解或緩和若干社會矛盾。……以華人為主的賭商當然也懂得其中的道理。他們之中的一部分開明人士，歷年來奉行‘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宗旨做了不少好事。……澳門的賭商不是在廣東兼營闖姓，就是捐有清廷官銜，與內地關係密切。賭商本是唯利是圖的商人，他們發財之後熱心社會慈善公益、參與各種政治活動，其中一個出發點不排除是要以行善沖淡開賭令人傾家蕩產、妻離子散的惡名，取得較高的社會地位”，如參與創辦澳門兩大華人慈善機構——同善堂、鏡湖醫院；向國內捐款賑災；進行義殮、舉辦平糶；參加澳門城市衛生及防疫工作；興學學校，如“1898年正月，何連旺在澳門開設澳門大同女學堂。（……）朝廷廢科舉後，盧兼若‘念華人子弟半多貧苦，少年不讀書識字，何以謀生，乃萃集同人籌措鉅資創辦孔教學校，每年生徒多至千數百人’”；支持變法維新、辛亥革命等。

古為今用

胡根研究的澳門博彩業發展史，雖然涉及僅係鴉片戰爭之後到20世紀初這段時間，但它對當今澳門博彩業的未來發展卻相當有借鑒意義。眾所周知，自從2003年澳門博彩業取消專營以來，澳門的博彩業曾經出現過一次井噴式的爆發性增長。這表現在：一是博彩經營牌照由原來的一個改為三個，後又經過分拆；二是賭場大增；三是賭場收入大幅增長；四是博彩業在經濟生活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出現了“一枝獨秀、百業受抑”的局面。而博彩業一枝獨秀，也引發了澳門許多社會問題。

有鑑於此，中央政府高度重視此問題，國家主席胡錦濤去年赴澳門出席慶祝澳門回歸十週年

與澳門特區第三屆政府就職典禮時，曾發表重要講話，要求新一屆特區政府在澳門建設和諧社會，在經濟上要求澳門要適當多元。

澳門特區新一屆政府也意識到了博彩業一枝獨秀所帶來的社會問題的嚴重性，正在着手調整，澳門經濟又面臨一次新轉型。

胡根此著問世於澳門經濟新轉型即將展開之際，可謂身逢其時。澳門近代博彩業發展歷史的經驗，值得借鑒。這些借鑒之處，有下面幾個方面：

一、特區政府應該加強對澳門博彩業的監管。近代澳門博彩業的發展，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在澳葡政府的監管下發展起來。而且，澳葡政府對博彩業的監管是日趨成熟而有效的。

二、特區政府應該對澳門的博彩企業，採取類似澳葡政府的做法，對中外企業一視同仁，不能內外有別，華洋異體，以體現公平原則。歷史上，雖然博彩業的賭商多為華人，澳葡政府對承充開賭者，卻是沒有國籍限制的，對來投充者，澳葡政府採取了中外一體的政策。

三、特區政府應該充分重視當前博彩業高度繁榮所帶來的相當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些問題，對外來說，涉及到澳門與廣東、澳門與內地的關係。在近代，澳門博彩業幾起幾落，興衰不定，就是沒有處理好澳門大力發展賭博業與內地、特別與廣東的關係，出現了以鄰為壑的局面，澳門博彩業的繁榮是建立在內地深受其害的基礎上，導致了澳門博彩業不能順利發展。目前澳門博彩業的繁榮，其實很大程度上也建立在內地遊客赴澳門的基礎上。對內來說，博彩業蓬勃發展，導致了佔用大量社會資源和人材，壓縮了其它行業的發展與生存空間；賭牌眾多，賭場林立，競爭激烈，必然導致許多社會問題，如青少年沉迷賭博、無心向學、價值觀扭曲；社會治安不靖；通貨膨脹，交通擁塞，生活品質下降等。歷史的舊戲，又在新形勢下的澳門重新上演！掩卷之餘，一個想法油然而生：歷史的經驗能否給今天提供借鑒？